

华侨遭屠杀
1565年,西班牙殖民者入侵菲律宾,1571年建马尼拉城。西班牙人对菲律宾统治初期,对当地华人采取拉拢政策,因为菲律宾当时的经贸发展要仰赖华人的努力和贸易。但随着华人影响的提升,矛盾开始显现。

1574年,活跃于福建一带的私人武装头领林凤差点攻占马尼拉,让西班牙殖民者大为恐惧。1593年,菲律宾总督达斯马里斯远征摩鹿加群岛,由于他强迫华侨充当桨手,引发不满。途中,达斯马里斯所在旗舰上的华侨奋起反抗,将船上包括总督在内的西班牙人几乎尽数杀死,随后驾船逃走。这次事件后,马尼拉当局煽动排华浪潮。在这一背景下,一支中国船队在福建官员带领下,载着士兵和武器到达马尼拉,接回3000名华侨。

1603年,菲律宾岛又出现一则传闻:中国皇帝有意占领菲律宾以获取这里的黄金。西班牙人惊恐万分,打算迫害甚至屠杀华侨的意图越来越明显。10月

晚明华人反暴政

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,明王朝部分开放海禁,而刚刚殖民菲律宾的西班牙对商品和人员极为渴求。华侨的增多今晚明帝国与西班牙在菲律宾产生碰撞。



3日,不愿坐以待毙的华侨发动起义,但由于缺少武器和军事经验,他们仅坚持了41天。起义很快演变成一场大屠杀。据统计,至少2万名华侨被杀。

明廷的轻视

屠杀华侨对菲律宾本土经济产生致命影响。西班牙人忧心中国商船不再到来,更担心明朝政府会进行报复。1604年6月,一批对前途悲观的富人离开马尼拉,举家迁往墨西哥。眼见如此,西班牙驻菲总督一面部分发还华侨商人的财产,发动幸存者给国内写信,企图证明西班牙殖民者“清白”;一面派特使携带函件,想要交给中国沿海省份的封疆大吏。

事实上,尽管明朝当局了解了事件真相,但一贯把移民国外的华侨视为贱民,因此仅写了一份《谕吕宋檄》,于1605年5月底、6月初由中国贸易船队中一名船主带到马尼拉,分别交给菲律宾总督、马尼拉最高法院和马尼拉大主教。檄文未对屠杀行为进一步严加追究,只要求西班牙殖民当局保证华侨今后生命财产的安全,并宣布对殖民者“不忍加诛”“其海外戕杀姑不穷治”,要求西班牙方面“当思皇帝浩荡之恩,中国仁义之大”。

明朝未出兵讨伐还有当时现实条件的限制。在西班牙屠杀华侨大致同一时期,大明王朝进行了三场大规模战争:在西北

的宁夏,西南的播州,特别是从万历二十年开始的长达7年与日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。这三场大战明朝都取得胜利,但国家军事和财政资源损耗极大。

郑成功震怒

明朝的纵容使得殖民者对菲律宾华侨的欺压更加有恃无恐,绝境中的华侨不堪其苦。1662年,得知菲律宾华侨的悲惨处境后,已经攻下台湾的郑成功派人向菲律宾总督下书,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,严令其改邪归正。

面对郑成功的威胁,西班牙人反而进行了第三次对华侨的集体屠杀。郑成功闻讯大怒,他一面抚恤逃到台湾的华侨,一面组织筹备军队,准备远征菲律宾,在菲律宾重建大明王朝。

但郑成功尚未出兵就出现内乱,他的儿子郑经接着治理台湾,并派人同西班牙殖民当局交涉。

明朝未出兵讨伐还有当时现实条件的限制。在西班牙屠杀华侨大致同一时期,大明王朝进行了三场大规模战争:在西北

(摘自《牛城晚报》其言/文)



尊老爱幼 传承家风



周恩来巧妙示警澳门总督

1555年是葡萄牙人自认为在澳门开埠的时间。1955年,葡萄牙政府决定举办庆祝“澳门开埠四百周年纪念”活动,澳葡总督府规划了为期一个月的“庆祝程序”。为防备中国政府,当时的澳门总督史伯泰决定,纪念活动的筹备秘而不宣。然而,消息还是传到北京,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。

然而,庆祝活动一直都在秘密筹备,中方只是得到消息并没有确切证

据。加上当时中葡两国尚未正式建交,怎样巧妙地获得活动信息,怎样向史伯泰传递中方立场,成了周恩来面临的主要困难。

机会来了。1955年10月,行将任满的港英总督葛量洪希望访问北京。周恩来迅速批准并亲自设宴款待。谈笑间,周恩来突然问葛量洪:“听说澳门政府正在准备庆祝‘澳门开埠四百周年纪念’活动,阁下知道这件事吗?”葛量洪有点猝不及防,讲了实

话:“我已收到请柬,也接受了邀请。”周恩来当即严肃地说:“中国政府和人民都不喜欢这种庆典,澳门和香港的中国人也不喜欢。我认为,这个庆典应该取消……”葛量洪把周恩来的话报告给英国外交部,并提议转达给葡萄牙政府。周恩来就这样巧妙地把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传递给了葡方。最终,葡萄牙于10月21日以“经费不足”为由,宣布取消庆典活动。(摘自《档案春秋》)

宋真宗:主业是皇帝,副业当医生

宋太宗赵光义(976年即位后改名赵灵)即位之前,便在自己封地里非常留心医术方药。经多年辛苦收集,竟“藏有名方千余卷,皆有验”。976年,赵光义执政,亲自下诏在京师置香药交易院,促进了中外名贵药材的交流,并由此而产生了许多以“香药”为主的中成药。

宋真宗赵恒是宋太宗第三子,他受到过父皇的言传身教,也有较高的医药学素养。

据《本草纲目》卷34“苏合香”项记载,宋真宗曾因太尉王钦若气弱多病,面赐药酒一瓶,令空腹饮之,云“可以和气血,辟外邪”。王太尉饭后“大觉宽健,次

日称谢”。宋真宗说:“此苏合香酒也,极能调和五脏,却腹中诸疾。”并且他还在朝上向大臣们详述该酒的制备方法,自此,“宦宦之家皆仿为之,遂此方盛于时”。此酒功效在于散寒通窍,温经通脉。制备方法也比较简便:取苏合香丸50克,放入1000克米酒中,用火稍煮,使药丸完全溶化后即可。

《宋史》中记载:大臣王旦患病,宋真宗曾“御手调药,并以薯蓣粥为赐”。薯蓣即山药,有补中益气、调理脾胃的作用。当时龙图阁(北宋初年开封宫城中所建的一座馆阁,存放皇帝御书御画、皇家重要文献及宝瑞等物)学士杜

镐突得重病,宋真宗亲自“调药饮之”,说明宋真宗对药物调制是很熟悉的。

当时的太医院院长赵自化撰写《四时养颐录》,宋真宗阅后,改书名为《调膳摄生图》,还写了序言,使药膳和饮食疗法得以盛行。

宋真宗又亲自选出两本有关养生保健的专著——《四时摄生论》和《集验方》,命令雕版印行,颁发天下,期盼人人都能受益。据《宋史·真宗本纪》记载:在酷暑之际,宋真宗曾令“京城役工减日课之半”,从而保障劳动者的健康。

宋真宗丰富的卫生保健方面的实践,无疑促进了当时药学的发展。(摘自《老年文汇报》常敏毅/文)

梵高的《加歇医生肖像》去了哪里

打算一起带入棺木,让两件名作陪葬,和我一起变为尘土。”1996年,斋藤了英因脑血管梗死逝世。在他死后,《加歇医生肖像》的归宿却成了一个谜。

《加歇医生肖像》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,它究竟去了哪里?答案恐怕得从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说起。

1985年的“广场协议”后,日元不断升值,日本国内的投机气氛却异常热烈。商人从土地交易中获得的巨额利润被用来购买股票、债券、海外的不动产、名贵的艺术品和古董,等等。就在这个时期,日本实业家在全球艺术市场掀起了收藏印象派画作的热潮。

1987年的苏富比秋拍中有印象派画作,其中最贵的10幅中的5幅都是日本人买下。1987年到1990年间,拍卖会上40%印象派作品落入日本买家之手。



1990年5月15日,纽约佳士得拍卖了一幅梵高的重要作品《加歇医生肖像》,成交价高达8250万美元,它被认为是梵高最好的作品之一,而这一价格也创下当时艺术品拍卖的纪录。

天价买下这幅绘画的是日本第二大造纸商“大昭和制纸”名誉主席斋藤了英。斋藤了英只与这幅画作相处了几个小时,就将它锁进了有控温控湿设备的保险柜中。两天后,斋藤了英又在纽约苏富比以7810万美元买下雷诺阿的杰作《煎饼磨坊的舞会》。斋藤了英曾表示:“死后

钱越多就越幸福,其实不是这样的。

我一个月只有500元钱,变成1000元钱,就涨了一倍,但很难说我的生活质量也可以提高一倍。从1000元钱到2000元钱,也许又能提高一倍,我能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。有了很多钱以后,再增加的钱,你可以把房子弄得更大一点,还可以多买一套房子,你的生活质量就因此提高了吗?不见得。

当我没有住房的时候,买到一间房子,我的生活质量就大大地提高了。150平方米变成200平方米,生活质量当然也大大提高。从200平方米变成1000平方米的时候,生活质量提高了5倍?绝对不是,因为大部分的空间对你的生活是没有任何作用的。

钱就是这样,越多就越和个人生活没有关系。你有几千万还是几亿,只是身家有所不同,你的个人生活不会因此有很多不同,它们只是一个数字而已。

所以,钱多到一定程度,你就不能再从物质方面提高生活质量,只能从别的方面去提高了,从什么方面?当然是精神方面。如果你的精神方面没有提高,你的生活质量也就到此为止了。

(摘自《意林》周国平/文)

真实的『唐僧』后来很落寞

贞观十九年,西行取经十七载的玄奘还没回到长安,正在洛阳的唐太宗李世民便接见了他们。人们惊叹于他的传奇经历,感动于他的执着,体味着他千辛万苦的磨难,欣赏着他带回来的大批珍稀宝物。

然而一阵热闹过后,李世民立即要他还俗为官,为扩张帝国版图发挥作用。李世民紧急下诏,令玄奘将西域的风土人物、山川地理及政治文化记录下来,为其征伐这些地方提供第一手资料。玄奘只得夜以继日地“奉诏撰述”,在辩机等人的协助下,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《大唐西域记》的创作。

投桃报李的李世民准了玄奘译经的请求,并调集当时国内学识一流的僧人协助,让他在长安安心译经,并按照他从天竺带回的塔形规制修建了大雁塔,供奉他带回的佛像。

但李世民对这些佛经并不感兴趣,他志在将大唐的声名远播宇内,让周边各国都臣服在“天可汗”威名之下,于是,他又强令玄奘紧急翻译老子的《道德经》等一批道家著作,并让王玄策等出使印度时,带去那里发扬光大。

唐高宗李治继位后,亦只是把佛教当作驭民的工具,不仅严辞拒绝了玄奘“先佛后道”的请求,还不让玄奘去少林寺译经,玄奘“不敢更言”,最终只有回到原来的玉华寺翻译经卷。四年后,玄奘病逝,一代高僧就此谢幕。他取回的“真经”,在普及上也远不及其他将佛理简化的教派,后来在多次“灭佛”的浩劫及战火中消失殆尽。直到清末民初之时,当王道士无意间打开敦煌藏宝窟时,才发现有他所译经文的抄本。而他所创的“法相唯识宗”,也两代即亡。

(摘自《文史博览》张屹/文)

这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很多日本买家并不是把画作为艺术品来收藏的,而是作为一种金融工具起到投资和融资的作用。1989年,日本富士银行和世尊信用卡两家公司开始开展绘画担保贷款业务,作品价值的80%可以融资,由西武百货评估。仅半年时间,融资金额就达到500亿日元。

收购热潮后,日本人手持有的印象派作品多达上万件,总价近百亿美元。到了1991年,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破裂,这些作品大多成为日本银行中不良贷款的抵押品。

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导致大部分藏家现金流紧张,绝大多数艺术品由托管银行保存,大部分藏品以担保抵押方式抵押给银行。银行需要现金回流,会把这些抵押作品送至欧洲拍卖行拍卖。所以,有些世界名画在日本还没来得及露脸,又匆匆回到了欧洲。

斋藤了英在购入梵高的《加歇医生肖像》时,财务状况并不像人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么风光,他的企业已经负债累累。1982年,日本第二大银行

住友银行指责斋藤了英的“大昭和制纸”经营不善,要求他出售个人艺术收藏以缓解公司债务压力。1986年,其公司欠债已经高达464亿日元。

由此推断,很大的可能是,斋藤了英买到画之后,转手就抵押给了银行。

有种说法,斋藤了英的两件藏品以“担保抵押品”的名义抵押给富士银行。通过苏富比安排的私下交易,《煎饼磨坊的舞会》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收藏家,据说这件作品现在在瑞士收藏家手上。而《加歇医生肖像》1997年就已通过苏富比,以私下交易的方式,转让给奥地利出生的投资基金管理人沃尔夫冈·弗吕特厄;据透露,作品当时成交价为9000万美元。其后,据说弗吕特厄因财务危机,被迫将此件作品转手给匿名藏家。画作至今仍未露面。

《加歇医生肖像》从欧洲大张旗鼓来到了日本,又从日本悄悄回流到了欧洲,这背后的力量就是金融泡沫和经济周期。

(摘自《视野》岑嵘/文)

